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11期）

“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 中国经济发展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5年11月



2025年11月23日

“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 与中国经济发展

报告人：刘青

2025年11月23日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 “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是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新变化**、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要求、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建议》共有15个部分、61条，分为三大板块。
- 第一板块是总论，包括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抓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指导思想，6项原则，7项主要目标）。
- 第二板块从第三部分到第十四部分为分论，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12项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 第三板块由第十五部分和结束语组成，主要部署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等任务。

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 系统观：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内观察思考，统筹国内国际（why and how）
-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7，11）

提纲

- 一 . 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 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巨变
 - 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 经济全球化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 二 . 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 我国出口并未“过度”，而是量大
 - 我国进口明显不足
 - 我国产业发展成就显著、特点突出
- 三 .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 （供给）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国际、国内
 - （需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劳动力价格闯关”

（外部 内部 变革）

提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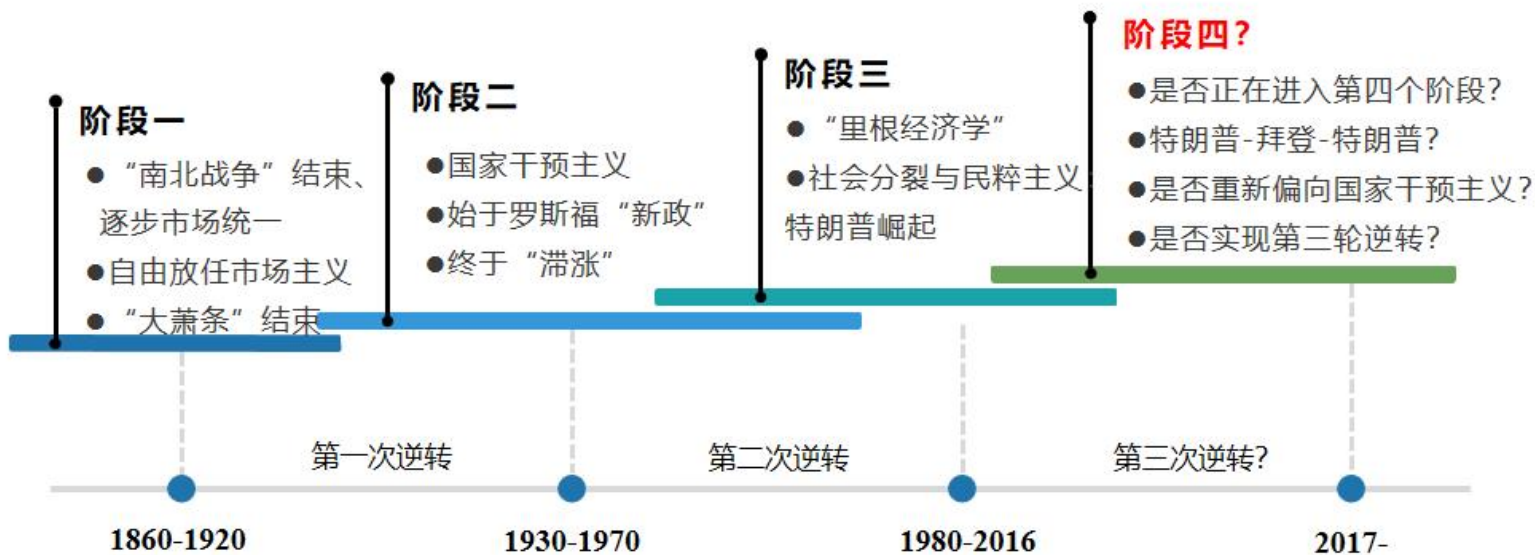
- 一 . 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 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巨变
 - 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 经济全球化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 二 . 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 我国出口并未“过度”，而是量大
 - 我国进口明显不足
 - 我国产业发展成就显著、特点突出
- 三 .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 （供给）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国际、国内
 - （需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劳动力价格闯关”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美国怎么了？认识当前美国经济治理需要大历史视野
(失常 vs. 新常态)

大历史视野下的美国经济治理：是否正在逆转、进入新阶段？

➤ 四个阶段、三番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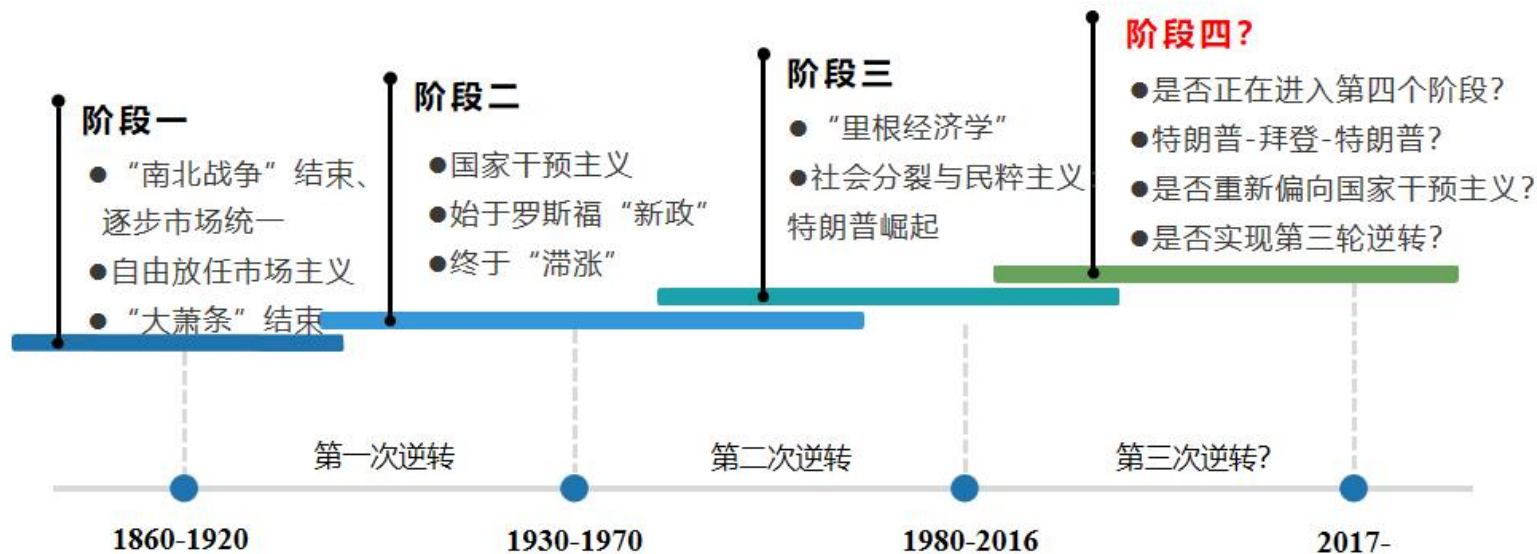
► 政策转变的根源：美国国内深刻的分裂及日益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

- 经过四十年极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思潮指引下的经济治理，美国社会成为一个深陷分裂、充满愤怒的国家：经济分化、社会分裂、政治极化
- 出于对美国社会的修复，以及更为现实的——吸引中低收入群体选票考虑，选战不得不采取迎合中下阶层利益的策略，从而带来美国社会、经济、政治转型
- 新经济思潮的使命，注定在于应对经济分化、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的局面，应对的方式则是重拾国家干预主义
-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是否迎来第三次逆转（混乱期）？



大历史视野下的美国经济治理：是否正在逆转、进入新阶段？

➤ **四个阶段、三番逆转：**保护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VS. 自由主义



一场美国经济治理思想大变革的时代已来临，未来保护主义、国家干预主义色彩会更强，自由市场经济色彩会下降，必将对世界及其他国家、围观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影响，需要正确认知变化，不能刻舟求剑。

当前主要国家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巨变

- **典型代表：**
- 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强化产业政策引导，旨在重塑其全球竞争优势。2025年3月，成立“美国投资加速器”，旨在简化超过10亿美元投资的审批流程；《大而美法案》体现了其在财政政策上的战略性调整等。
- 德国通过全面的税制改革，提升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2025年7月生效的《即时税务投资计划法案》引入了加速折旧措施，分阶段调降企业税率的清晰路线图。从2028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15%起逐年调降，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至2032年最终降至10%，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大力强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力度，修订后的《研究补贴法案》扩展了可申报费用范围。
- 英国发布《现代产业战略》明确了未来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八大高增长行业。2025年6月，重点关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与技术、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创意产业、国防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并为每个行业制定专属的十年发展计划。高度重视人才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国家创新能力。
- 加拿大通过“购买加拿大”政策，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韧性，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 意大利则通过战略性投资关键赋能技术，重点支持特定技术领域和地区发展，提升产业长期竞争力。2025年10月底，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公布了7.31亿欧元的资助计划。
- 日本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对策草案提出将船舶、无人机、人造卫星、火箭零部件、呼吸机和磁传感器新增为“特定重要物资”，由国家承担其稳定供应所需的部分费用

当前主要国家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巨变

- **典型特点：**

- 发达经济体的新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导向性和选择性，聚焦特定战略领域。各国不再采取普适性的产业政策。
- 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切，推动供应链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
- 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深度融合，财政手段成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更加显著，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竞争态势的严峻判断，即长期结构性风险已经超越了短期周期性风险，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考虑，国家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
- 创新驱动与人才竞争成为政策发力点，各国竞相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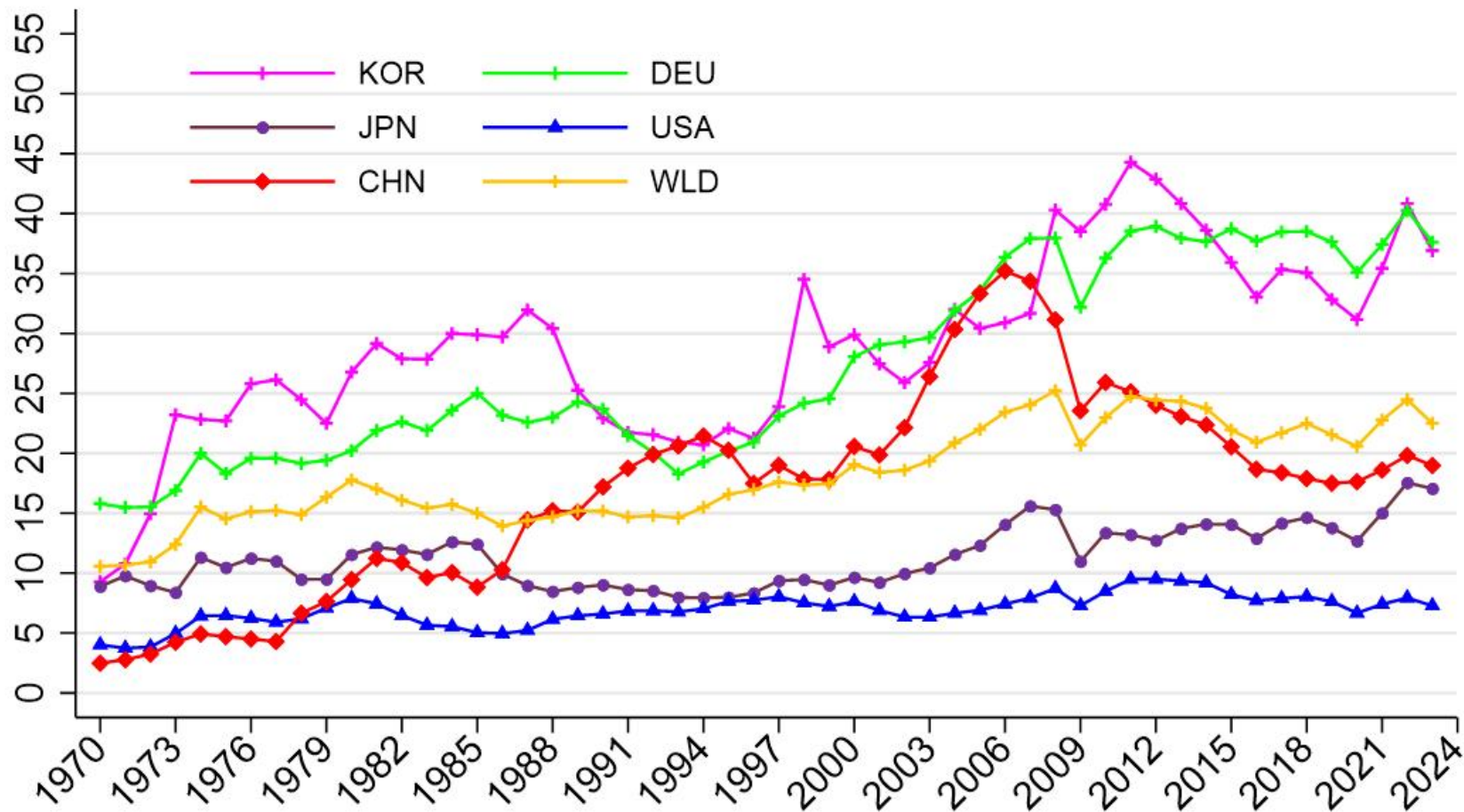
- **深层原因：**

- 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安全担忧
- 新科技革命下的技术竞争与产业升级压力

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 2008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模式的系统性变化：出口依存度下降，更依赖内需；GVC整体下行阶段
- 自2006年之后我国经济逐步转向依赖内需
- 2008金融危机后各国、全球出口依存度均有下降态势（疫情期间除外）——转向内需发展：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

出口/GDP



➤ 2008年以来，GVC多个指标已呈现下降趋势

FIGURE 1.2 Trends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 as a share of global GDP, by type of value-added creation activity, 1995-2017

Perc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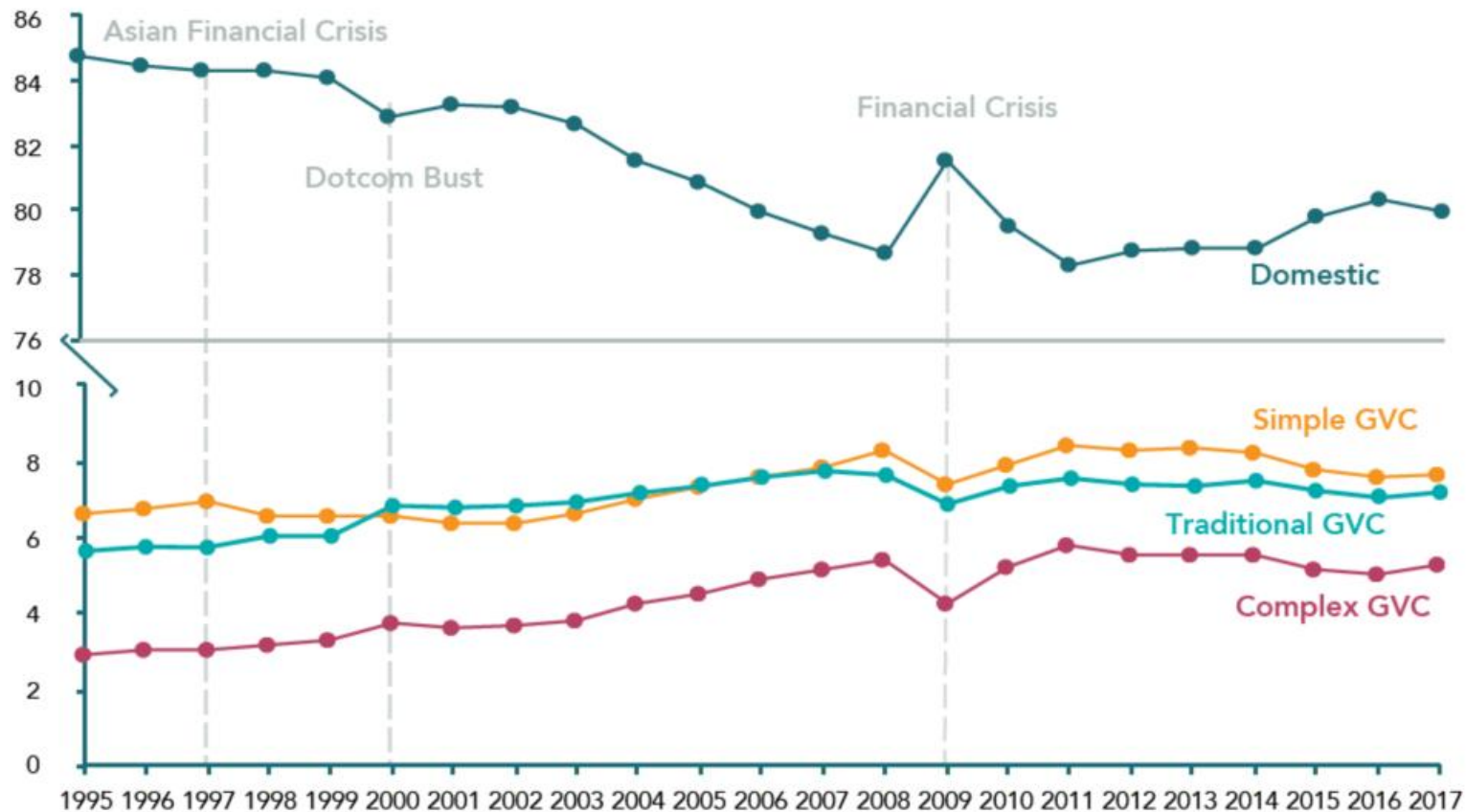


FIGURE 1.6 The changing intensity of GVC participation by income groups, 1995-2017



World Bank 2019

前向参与度: 该行业的增加值中, 有多大比例继续用于GVC生产

后向参与度: 该行业的最终品产出中, 有多大比例使用来自GVC的增加值

TABLE 1.2A Forward GVC participation indexes by industry groups

(percent of value added)

Sector level	GVC participation			Simple GVC			Complex GVC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High Tech	25.3	30.7	28.8	13.8	16.1	15.6	11.5	14.6	13.2
Middle Tech	22.5	21.6	23.7	14.5	16.4	14.7	8.0	9.7	9.1
Low tech	12.4	15.8	15.3	7.9	9.9	9.5	4.5	5.9	5.8

TABLE 1.2B Backward GVC participation indexes by industry groups

(percent of final goods production)

Sector level	GVC participation			Simple GVC			Complex GVC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2000	2007	2017
High Tech	22.3	28.8	26.8	8.4	9.8	9.6	13.9	19.0	17.3
Middle Tech	19.1	26.9	25.9	10.0	14.4	13.2	9.1	12.5	12.7
Low tech	16.6	21.8	20.5	9.9	11.7	10.5	6.7	10.1	10.0

World Bank 2019

前向参与度：该行业的增加值中，有多大比例继续用于GVC生产

后向参与度：该行业的最终品产出中，有多大比例使用来自GVC的增加值

➤ 全球化进程本身具有周期性特点

- 全球化不是线性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就是波浪式发展：Baldwin R E , Martin P J .Two Waves of Globalisation:. [J].General Information, 1999.
- 一、第一波全球化浪潮（19世纪中期-1914年）
 - 工业革命推动市场扩张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催生蒸汽动力与铁路运输，加速商品和资本跨国流动，但此时全球化局限于欧洲主导的殖民体系。
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14年）通过电力、电报和轮船技术，形成全球性资源调配网络，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 体系脆弱性暴露
一战爆发（1914年）后，国际贸易锐减40%，金本位制崩溃，全球化进程首次逆转。
- 二、停滞与调整期（1914-1945年）
 - 经济民族主义兴起
1929年经济大萧条导致各国大幅提高关税（如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全球贸易额下降66%。
二战期间军事对抗割裂全球经济体系，战前建立的国际分工网络解体。
- 三、制度化全球化阶段（1945-2008年）
 - 规则主导的复苏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通过IMF和世界银行建立固定汇率制度，推动贸易自由化。
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贸组织（WTO）的演变（1995年），标志着多边贸易规则成熟。
- 四、逆全球化与新形态博弈（2008年至今）
 - 金融危机冲击
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如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
 - 结构性矛盾激化
2016年后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等事件反映分配失衡问题，环境成本加剧反全球化运动。
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
- 过去近半个世纪全球化的线性发展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性过程

外部环境变化危、机并存

- 有利：

-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可能通过拉动全球需求，对我国出口产生积极影响。
- 发达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客观上会加速全球技术进步，知识溢出。
- 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过程中，我国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可成为输出方，获得一定的便利。

- 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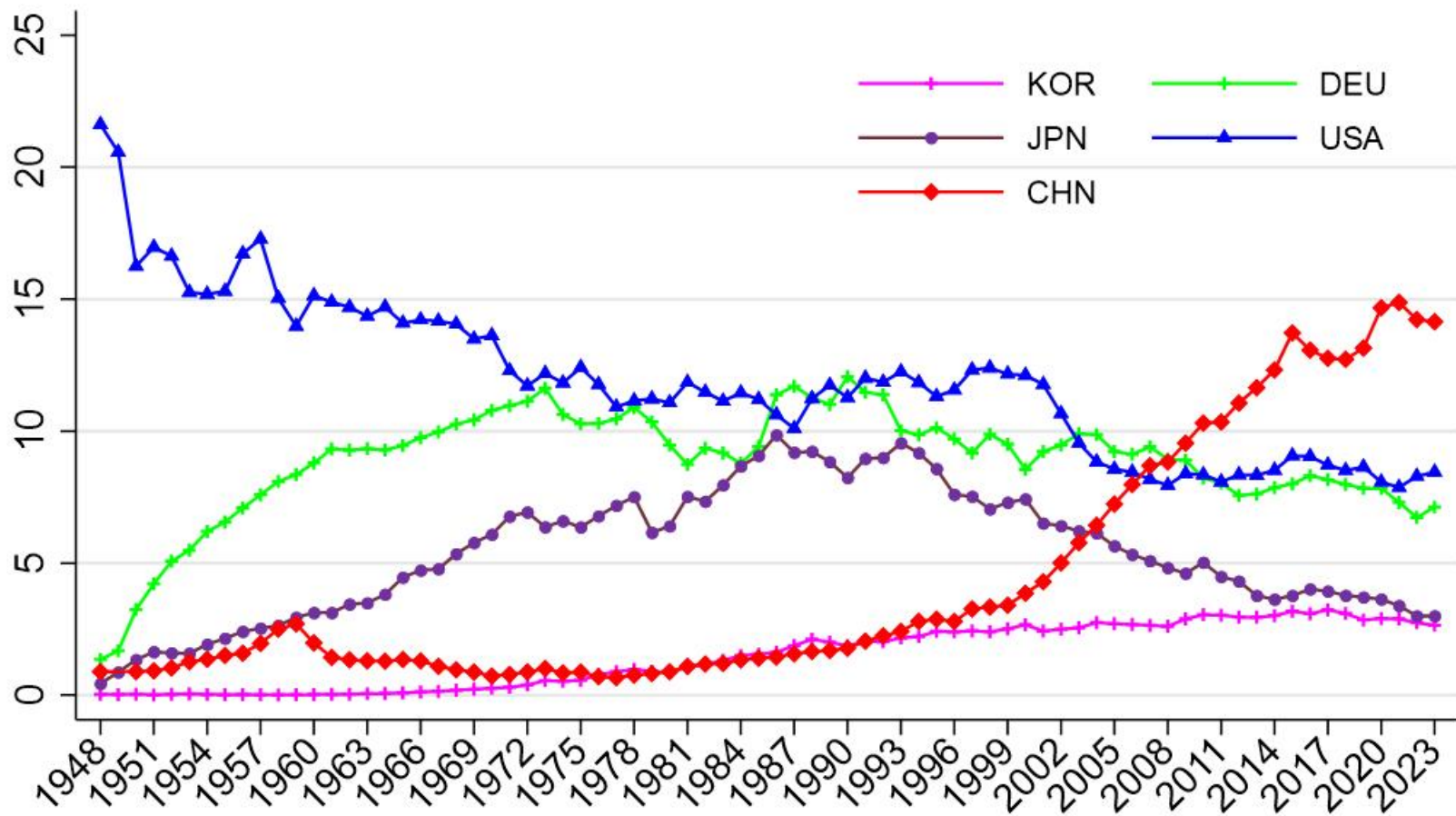
- 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我国技术获取难度，增加创新成本。
- 各国都希望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市场与产业保护，幼稚工业保护。
- 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经贸秩序不确定性上升，环境恶化。
- 全球贸易需求相对下降，国际市场空间越发拥挤、竞争越发激烈。

提纲

- 一 . 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 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巨变
 - 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 经济全球化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 二 . 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 我国出口并未“过度”，而是量大
 - 我国进口明显不足
 - 我国产业发展成就显著、特点突出
- 三 .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 （供给）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国际、国内
 - （需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劳动力价格闯关”

➤ 中国贸易成就斐然

- 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例
 - 1958年与日本相当
 - 自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至201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持续增长，从未出现过下滑
 - 2009年我国出口占比达到9.57%，超越德国的8.92%与美国的8.41%，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 201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达到顶峰的13.79%，这是自1968年以后单个国家出口占比的最高记录（关注贸易战与疫情前的正常市场经济状态）（2021年特例：保供给vs保需求）
 - 美国1968年14%，二战后特定背景，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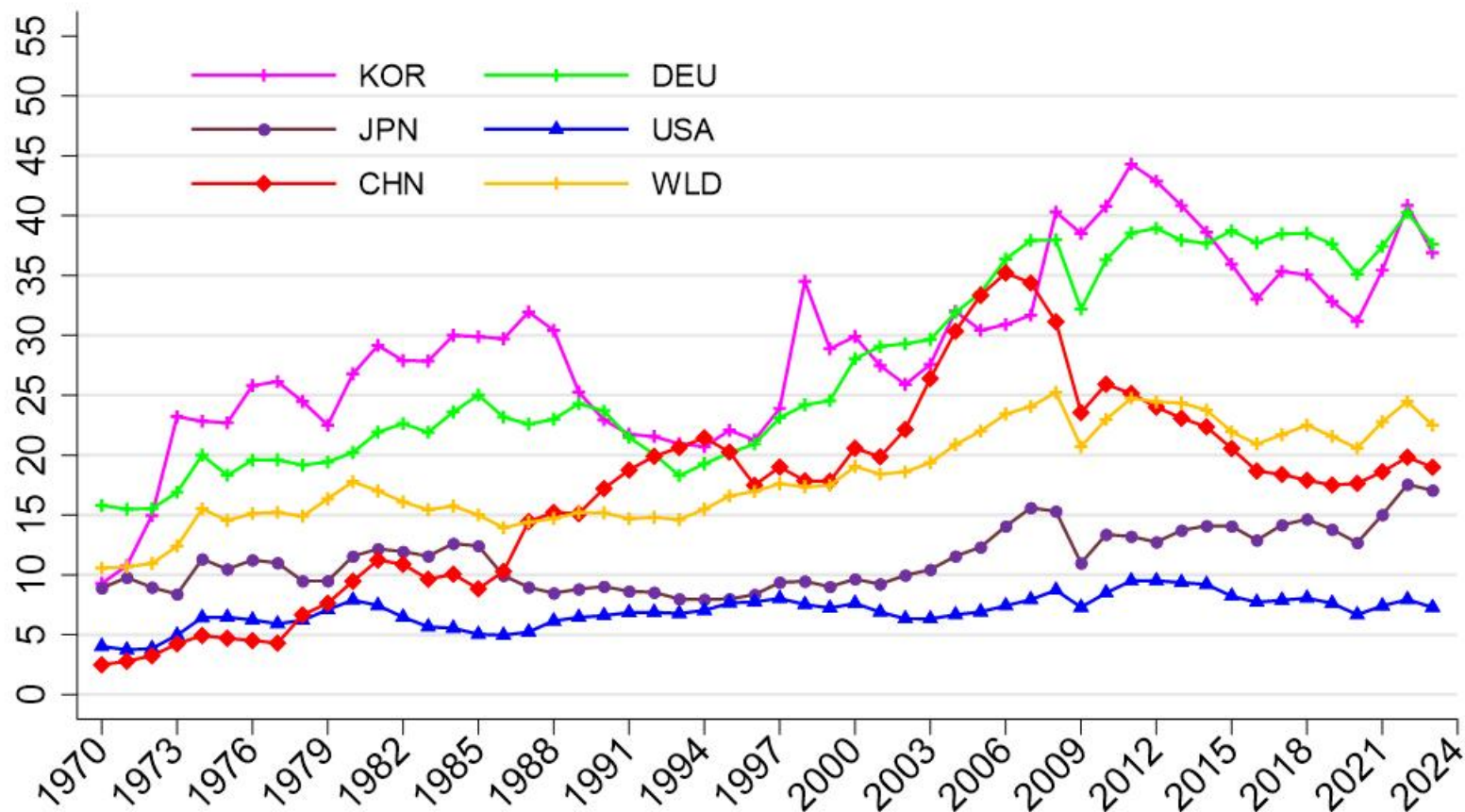
各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
(出口占比)

出口/GDP

- 中国持续上升，2006年（34.93%）后持续下降
- **2011开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当前远远低于德国、韩国

- 在整个1980-2023期间的所有年份（只有1994年、2006年前后除外），德国或韩国都高于我国；
- 相反，美国、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则一直相对较低

出口/G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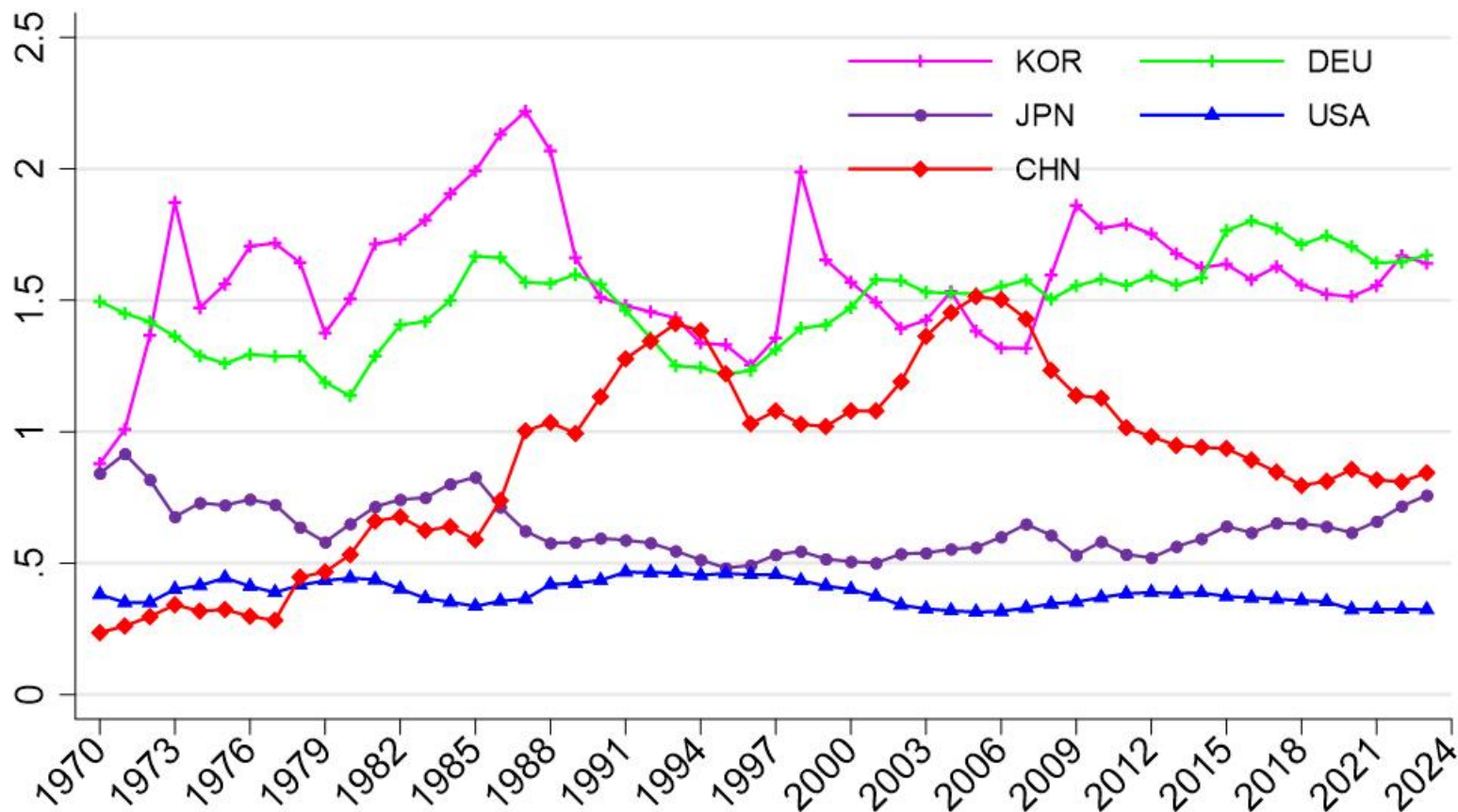


出口占比/GDP占比

- 相对于GDP份额，**2005年起持续下降，且中国2011后低于1。**
- 相对于GDP份额，
 - 德、韩出口不成比例地多
 - 美、日出口不成比例地少

出口占比/GDP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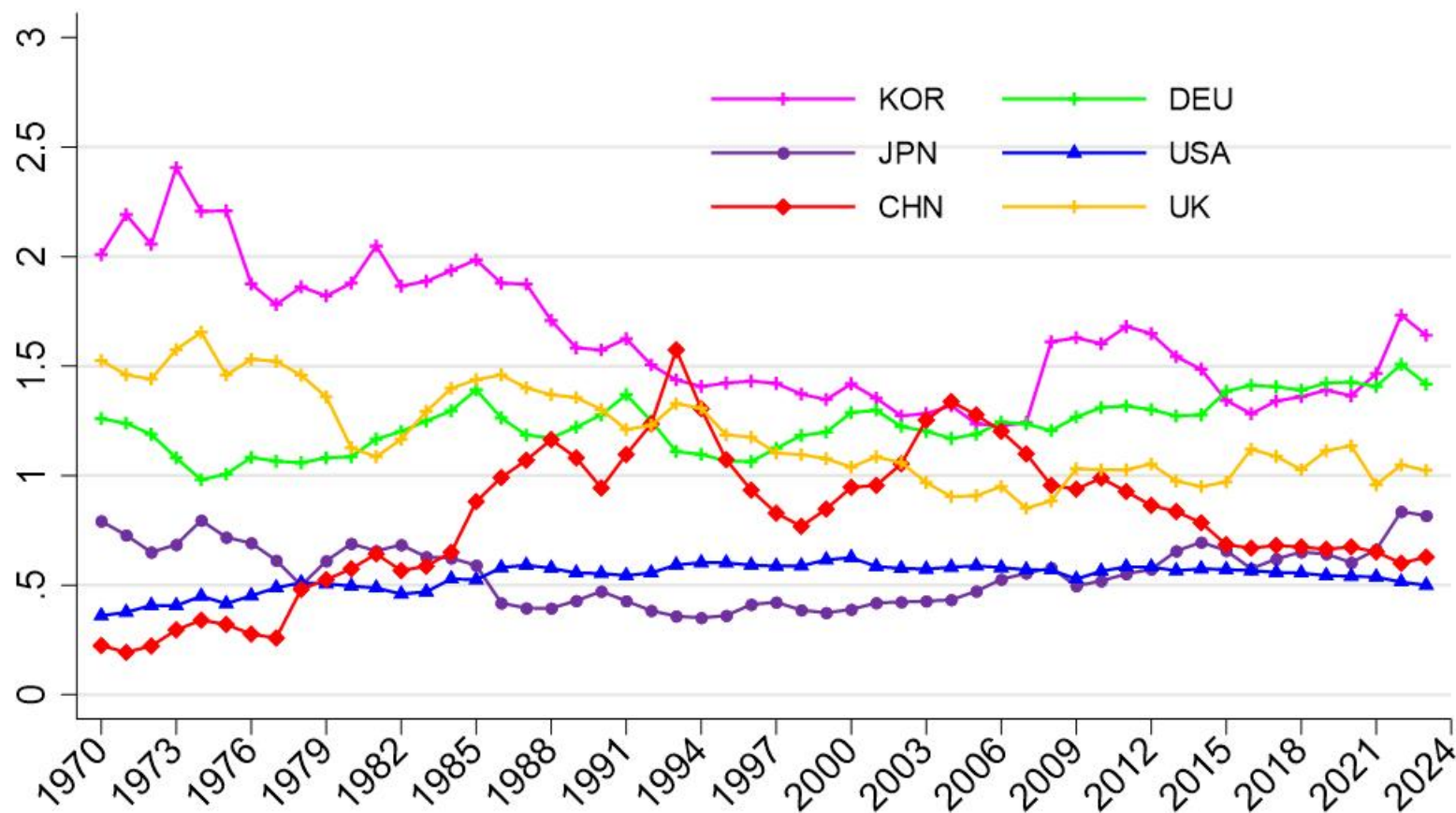
(各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例/各国GDP占世界总GDP比例)



进口占比/GDP占比

- 相对于GDP份额，
 - **2004**年起持续下降，
 - 且中国**2008**后进口“不足”；
 - 到**2023**年，我国进口占比只相当于我国GDP占比的约**60%**
- 相对于GDP份额
 - 德、韩进口不成比例地多
 - 美、日进口不成比例地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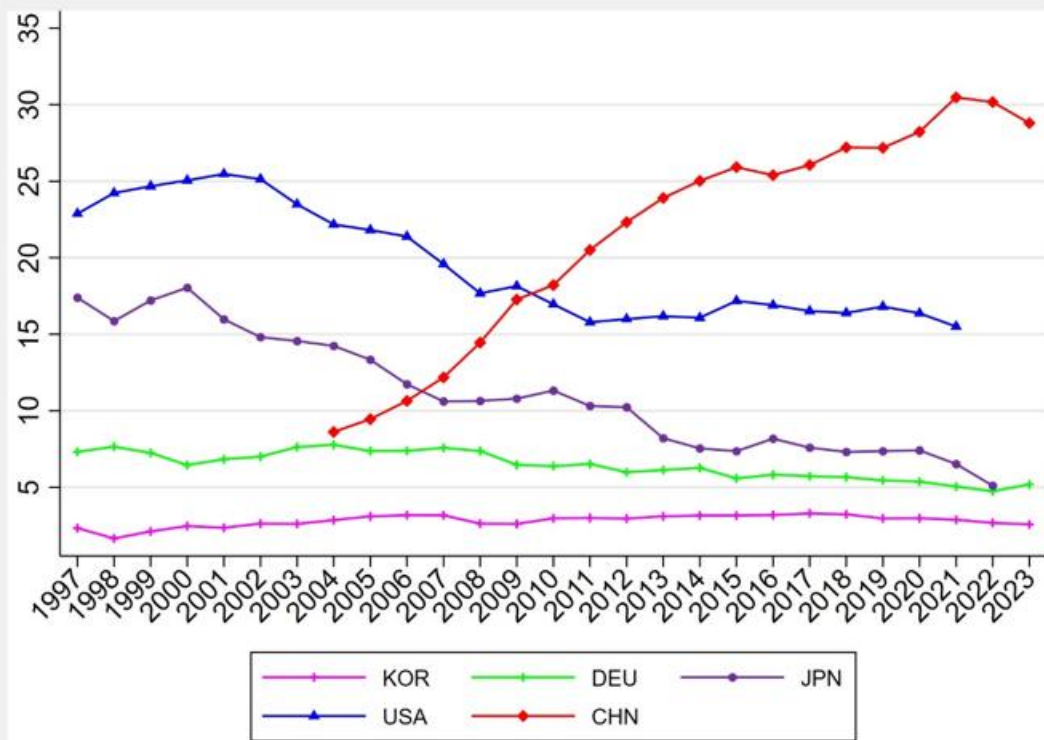
进口占比/GDP占比 (各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比例/各国GDP占世界总GDP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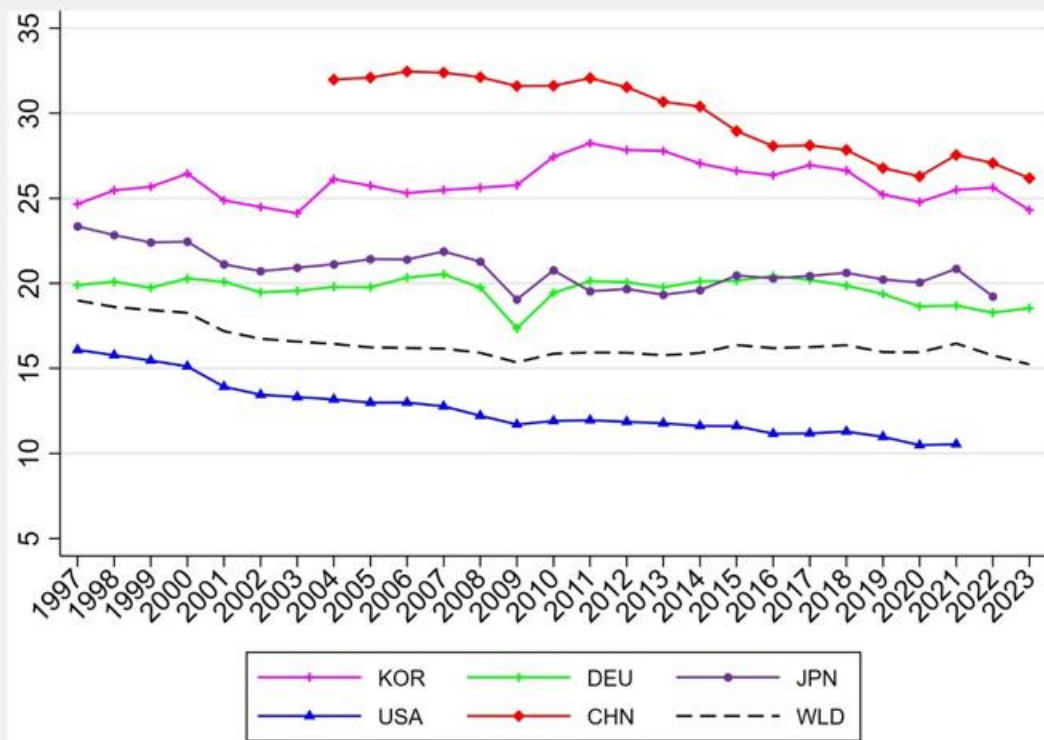
中国制造业成就无与伦比

-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其实是制造业
- 中国制造业特点：
 - 崛起速度快；
 - 产业规模大；
 - 产业门类全；
 - 前沿科技强
- 20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25%，中国则仅占6%。2023年中国制造业产值4.8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5%，美国12%、日本6%、德国4%、印度3%、韩国3%。
- 联合国《工业化的未来》（2024）报告指出，到2030年（线性外推），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例将进一步上升至45%。美国的占比将降至11%，日本降至5%，德国仅为3%，三国总和不足中国的一半。
- 中国是全球工业体系最完整国家，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大类、600多个细分行业的国家。
- 中国制造2025十大产业领域（**南华早报**：在“260多项具体目标”中，已有**86%获得实现**）
 - 在规模化应用领域（**新能源、高铁、光伏、船舶**）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但尖端技术（**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生物材料**）仍需攻坚。

➤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



各国及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之比

中国制造业成就无与伦比

- OECD 2023年：

汽车：中国制造占36%

冶金：中国制造占60%

手机：中国制造占53%

服装：中国制造占50%

化学：中国制造占36%

食品：中国制造占26%

半导体：中国制造占6%

电视：中国制造占90%

家电：中国制造占56%

机器人：中国制造占50%

造船：中国制造占49.8%

建筑业：中国制造占30%

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强烈关注

- 中国制造业特点：
 - 崛起速度快：世界调适期短
 - 产业规模大：冲击力强
 - 产业门类全：出口竞争对手众多；进口需求弱
 - 前沿科技强：未来竞争力会更强

- “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国的烦恼”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 按照过往自由市场规律，中国没有“出口过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出口不足，与德国、韩国相比我国更是出口过少
- 全球视野下看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贸易一个重要问题是进口不足，市场规模优势待发挥
 -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
- 中国面临“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国的烦恼”
- 但是世界变了！不能再以过去四十多年的经验面对当前面临的问题挑战、认知未来的发展模式

提纲

- 一 . 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 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巨变
 - 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 经济全球化波浪式发展的规律
- 二 . 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 我国出口并未“过度”，而是量大
 - 我国进口明显不足
 - 我国产业发展成就显著、特点突出
- 三 .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 （供给）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国际、国内
 - （需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劳动力价格闯关”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优化

- 一方面，跳出制造业来看制造业发展，从国家总体战略、未来世界秩序层面来看产业发展。需要考虑国际战略竞争中的国际关系大局、中国软实力、国际引领力，发展要更具国际包容性。
- 另一方面，制造业在国家发展与战略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制造业必须持续、高质量发展。
- 新背景下的发展方针，建议是**规模守正、结构创新**，建设“制造强国”，稳规模与优结构二者相辅相成。
-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 这意味着，在新阶段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增长模式需要优化
- 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重构（开放型经济的建设）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是关键

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重构

- 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重构——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是关键
- **（供给）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
 - 供给端需要更多地瞄准国内需求、国内消费，而非仅出口
 - 国际：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
 - 国内：产业的国内动态升级
 - 原则：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升级）（掌握主动权）
- **（需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战略选择，非权宜之计**
- 二者都很难，但必须突破

调整产业结构：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升级）

- 调整产业结构之国际：
 - 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而无法满足现代产业发展需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行业标准、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阻碍的落后产能；遵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 “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 “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

调整产业结构：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升级）

- 工业革命以来的四次国际产业梯度转移：雁行模式
 -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将纺织业转移至欧美国家
 - 1950-196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业转移至日本和西欧
 - 1960-1980年代日本又将同类产业转移至亚洲四小龙
 - 1980-2000年代亚洲四小龙转移中国沿海地区
 - 这种梯度式转移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分工深化，同时加速技术溢出效应，带动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形成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体系
 - 也有地缘政治因素：冷战时期美苏分别通过产业输出塑造了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的分工体系
- 近年来，中国东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也延续了这一逻辑，形成“国内梯度转移”
- 中国内部区域差异、内部市场纵深特点与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备产业链优势、政策调控（就业担忧）等，部分打破了传统雁阵的转移逻辑，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弱化

调整产业结构：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升级）

- 调整产业结构必须有取有舍，有序转移
 - 既做好国内梯度转移，也做好国际梯度转移：把握好平衡，防止产业空心化教训；保持内外产业与技术代差；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枢纽地位
 - 传统产业发挥好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不能“一退了之”。“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
 - 缓解我国面临的全球性贸易压力、塑造更好的包容性的外部发展环境；规避贸易战带来的**被动、无序、突发大规模产业转移**
 - 历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全球产业大转移（客观规律），未来五年十年，很可能迎来一轮新的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在产业的移入、移出上需要有提前研判。其中，以中国技术变革的速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近30%的产业基础，中国极有可能是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最重大来源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重大机遇，中国需要有所规划，在世界经济格局重塑中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 **形成我国主导的国际产业体系，巩固提升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枢纽地位——基本框架：生产函数+市场交易**
 - 生产函数：资本控制（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金融强国）；技术控制（体系、标准）
 - 市场交易：供给控制（关键资源与上游产品，eg 芯片产业EUV）；需求控制（关键下游环节，eg 稀土产业的提炼）

调整产业结构：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升级）

- 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也有难题：
 - 国内就业问题
 -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 农村（空心化）问题
 - 边疆问题
 - Etc
- “分类治理”思路
 - 核心是允许人口国内自由流动：从低生产率地区流向高生产率地区，解决就业与共同富裕问题，提高整体生产率、做大蛋糕，利用市场规律推动产业升级调整
 - 利用体制优势，做好分配调节，解决其他问题

调整产业结构：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升级）

- 调整产业结构之国内：
 - 产业的国内动态升级——新质生产力思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 核心是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
 -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创新
 - 高科技产业比较优势的来源是什么？
 - 开放型经济下如何促创新？

高科技产业发展与创新

- **第一、市场制度质量是高端产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来源**** (Nunn, 2007; Nunn and Trefler, 2014; Liu, Lu and Ma, 2015RIE)
 - 产业链长; 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细密
- **第二、好的市场制度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性优化资源配置**
 - 开放经济下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决策: 投资、并购; “全产业链模式” (Liu, Qiu and Zhan, 2019JIE)
- **第三、好的市场制度是实现“以竞争促创新”的前提条件,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Liu, Lu, Lu and Luong, 2021JDE)
 - 高成本、高风险; 高收益?
- **第四、好的市场制度是实现“以开放促创新”的前提条件,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Liu and Qiu, 2016JIE)
 - 互补还是替代 (拿来主义)?
- **第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创新的重要阻碍** (Liu and Ma, 2020JIE)
 - 观望、推迟创新
- 促进高端制造业、形成新比较优势的治本之策 (贸易强国战略): 市场制度质量
- 以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引领**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2021—2025年)》, 《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等

高科技产业发展与创新

- **发展高科技产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中国有两大重大优势**
 - 第一，在供给层面，我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 第二，在需求层面，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前景的市场空间。
- **产业基础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对发展高科技产业、新经济至关重要：依赖于产业链分工合作；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技术进步成果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降低成本（甚至美国科技成果也必须到中国落地，eg iPhone、Tesla模式）**
- **为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准备好了产业基础**
- **疑问：仅有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够不够？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机遇错过两次（例如，纺织业大国；经济大国）（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19世纪70年代电力；20世纪五十年代信息技术）**
- **优势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好的制度保障（成功抓住三、四次工业革命机遇）**

- **聚焦：充分挖掘这两大优势（《建议》做了充分部署）**
- 第一，需要迅速、实质性地提升契约执行力度、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市场制度质量。
 - 一方面，越是高端的行业，涉及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分工越是细密、复杂，产业链越长，从而越是需要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公平、公正、有力的契约执行，是促进企业之间协作的根本保障。
 - 另一方面，越是高科技行业，越依赖于企业创新，而好的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创新者收获创新成果的前提。
- 第二，进一步打破地方市场分割，整合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放宽民营企业准入，进一步全方位挖掘、壮大国内市场空间。
- 第三，继续坚定推进对外、对内开放。
 - 充分利用目前有利的国内政治局面，在长期为固化利益所阻碍的开放死角上取得突破，在一些不需要保护、甚至需要竞争刺激的领域，主动调整关税水平和外资准入管制。
 - 对民营资本开放应不晚于对外资开放。
- 第四，开放的态度面对新一代高水平贸易协定
 - 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数字经济等

未来产业及贸易发展基本格局：取决于产业结构变化

- 传统制造业vs. 高端制造业：赛跑
- 最优局面：传统制造业有序国际国内转移，高端制造业稳步发展提升
- 最差局面：传统制造业迅速抛弃或者被动转移，高端制造业发展不顺利
- 争取最优局面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 十五五时期第一个主要目标：“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
-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 “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 除消除各种消费壁垒，提振消费破局核心抓手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 收入是消费的根基
 - 扩大消费规模、进口规模；需求升级引导产业升级
 - 通过市场规律淘汰低效率产能、缓解出口压力
 -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为每月8000元人民币（约1150美元），而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为每月6000美元：是否需要如此的断崖式劳动力成本领先？
 -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
- “劳动者收入闯关”（“劳动力价格闯关”可比“价格闯关”改革）
 - AI时代更显紧迫
 - 建议：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型扭曲开始
 - 自由流动壁垒
 - 同工同酬
 - 过度加班：新增21%就业岗位（2024年中国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约为6.1亿，约1.28亿）
 - etc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CMF 宏观经济热点报告发布

11月23日,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 聚焦“‘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 来自政界、学界的知名经济学家**余淼杰、刘青、屠新泉、胡捷、梁明**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同时, 强调“十五五”规划是实现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分阶段有步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 是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新变化、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需要, 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性要求、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建议》指出,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 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 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从国际看,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 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 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 地缘冲突易发多发;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 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 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从国内看, 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 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同时,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有效需求不足, 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 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 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 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

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

基于这一背景，本报告在统一的框架体系内观察思考国际环境与国内发展两个方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二、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三、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

1、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

这些年来，所有人或许都曾提出过以下问题：美国究竟出现了何种状况？美国为何呈现出这般面貌？美国的政策为何是当前这样？其未来又将走向何方？针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意味着个人的决策与思考方向将截然不同——如果认为这仅是美国因特定总统个人因素导致的失常状态，那么或许数年后更换领导人便会有所改善；如果认为这是美国整体经济治理思潮发生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就会判断未来数十年将进入一种全新常态，而所有的决策方向都需随之调整。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审视美国经济治理思潮的变迁。对此，报告进行了简要总结。

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明确呈现出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是否已发生新的逆转、进入第四个阶段，值得思考。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才真正形成完整且逐步统一的市场。在此阶段，美国采取的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从华尔街崛起的历史中可清晰看出，当时处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状态，包括垄断、兼并等行为。这一阶段大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GDP增长了7倍。但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发现，20世纪初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达到了历史峰值，全国约1%的人口占据了全国40%以上的财富。

这种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即“大萧条”时期。“大萧条”爆发后，自由放任主义束手无策，无法终结危机，即便时任总统胡佛试图通过市场主义的手段应对“大萧条”，最终也未取得任何成效，反而使局势愈发严峻。此时，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进而进

入经济治理思潮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干预主义”，通过政府全方位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其中包括各类社会救济措施。如今美国的诸多社会机构，涵盖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机构及房贷机构等，均诞生于这一时期，后来的“两房”（房利美与房地美）最初也起源于“罗斯福新政”阶段。在西方经济治理体系中，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属于异类，其理论基础实则为“凯恩斯主义”，这是对美国第一阶段经济治理思潮的根本性逆转。

这一阶段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滞胀现象。在正常的自由市场环境下，滞胀本不应发生，因为经济停滞、经济萧条时期通常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般发生在经济过热时期。此时，若刺激经济增长便会加剧通货膨胀；若要治理通货膨胀，实施紧缩政策则会加剧经济萧条。因此，“国家干预主义”治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巨大困境。此时，美国经济进入第三个重要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经济学”，同期英国则有撒切尔夫人执政。这一阶段的核心模式为“新自由主义”，具体举措包括实施大规模减税、削减财政开支（尤其削减社会福利领域的财政开支），大幅下调公司税与个人税。如今美国的诸多税收基本格局，正是从里根时期的减税政策开始奠定的。在这一时期，美国相对快速地摆脱了滞胀困境，经济也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亦有大量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富分化问题，其根源便始于里根时期。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发现，当前美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源，正是里根时期的大规模减税政策，且自此时起，美国的贫富分化局面便未能再扭转。这一阶段持续至21世纪10年代，即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金融危机只是市场各类矛盾无法通过内部调节加以解决而出现的集中爆发，与此同时，伴随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推行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社会陷入高度分裂状态：一方面是国内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激化。最终形成的局面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社会分裂、收入分化、政治极化，进而导致民粹主义崛起，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便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事件。

在美国历史上，前三个阶段的划分及前两次治理思潮的逆转是极为明确的。当前我们需思考的问题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类治理模式，是否标志着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进入第四阶段，或是迎来了又一次新的逆转？

本报告认为，美国经济治理思潮已进入全新阶段，即第四阶段。美国大选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现实验证：特朗普上台后卸任，由拜登接任，此后特朗普再度当选，形成民主党与共和

党的执政轮替。从中可清晰观察到，政府对经济实施大规模干预并非某一位总统的个人决策——即便过渡至拜登执政时期，也没有发生任何转变，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社会政策的核心方向实则一脉相承。由此可见，美国经济治理已重新偏向“国家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而言，美国已迎来经济治理思潮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未来，保护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色彩将愈发浓厚，市场自由程度会被削弱。这种变化必将对全球、其他国家及微观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对此，无论是学界、政策界还是企业界，均需形成清晰认知，不可再秉持“刻舟求剑”的思维。

2、当前主要国家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巨变

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正在发生巨变，典型如下。

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强化产业政策引导，旨在重塑其全球竞争优势。2025年3月，成立“美国投资加速器”，旨在简化超过10亿美元投资的审批流程；《大而美法案》体现了其在财政政策上的战略性调整等。

德国通过全面的税制改革，提升其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2025年7月生效的《即时税务投资计划法案》引入了加速折旧措施，分阶段调降企业税率的清晰路线图。从2028年起，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从现行的15%起逐年调降，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至2032年最终降至10%，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大力强化对研发活动的激励力度，修订后的《研究补贴法案》扩展了可申报费用范围。

英国发布《现代产业战略》明确了未来十年的产业发展方向，聚焦八大高增长行业。2025年6月，重点关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与技术、金融服务、生命科学、创意产业、国防及专业服务等领域，并为每个行业制定专属的十年发展计划。高度重视人才与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国家创新能力。

加拿大通过“购买加拿大”政策，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韧性，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意大利则通过战略性投资关键赋能技术，重点支持特定技术领域和地区发展，提升产业长期竞争力。2025年10月底，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公布了7.31亿欧元的资助计划。

日本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对策草案提出将船舶、无人机、人造卫星、火箭零部件、呼吸机和磁传感器新增为“特定重要物资”，由国家承担其稳定供应所需的部分费用。

上述一系列政策变革呈现出四个典型特征：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新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导向性和选择性，聚焦特定战略领域，各国不再采取普适性的产业支持政策；

二是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成为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切，推动供应链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效率并重；

三是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深度融合，财政手段成为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其顺周期性更加显著，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全球化竞争态势的严峻判断，即长期结构性风险已经超越了短期周期性风险，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考虑。背后是国家经济治理模式深刻变革：宁愿加剧短期周期性风险，也要解决长期结构性风险；

四是创新驱动与人才竞争成为政策发力点，各国竞相加大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进力度。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包括地缘政治竞争与经济安全担忧，也包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国面临技术竞争与产业升级压力。

3、世界贸易与发展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模式已出现系统性变化，具体表现为各国出口依存度均呈下降趋势，即全球范围内，出口占GDP的比重已开始下行，无论是全球整体还是各个主要国家，均更加依赖内需。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的各项指标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处于整体下行阶段。我国也不例外：2006年之后，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下降，经济发展逐渐转向内需驱动。这表明，全球贸易增速已低于GDP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增速始终高于GDP增速，而2008年之后这一格局已发生逆转。

4、全球化进程本身具有周期性特点

全球化不是线性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就是波浪式发展。最早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伴随两次工业革命兴起，此后因各类体系脆弱性暴露，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化进程陷入停滞。

二战之后，全球化进入制度化阶段，当前各类全球化规则与体系，基本均在此后逐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实现了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程再度进入调整期，不再保持高速推进态势，甚至出现一定回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因此，我们不能以过去40余年所见证的全球化进程为依据，研判其未来发展方向，而应立足更长的历史视野，认识到过去半个世纪的线性发展，仅是历史长河中的阶段性过程。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可对全球化新形势形成系统性、长周期的理解。

5、外部环境变化危、机并存

在有利影响方面，一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可能通过拉动全球需求，对我国出口产生积极影响。二是发达国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客观上会加速全球技术进步，知识溢出。三是发达国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过程中，我国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可成为输出方，获得一定的便利。

在不利影响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我国技术获取难度，增加创新成本。二是各国都希望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纷纷出台市场与产业保护措施。三是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构，经贸秩序不确定性上升，环境恶化。四是全球贸易需求相对下降，国际市场空间越发拥挤、竞争越发激烈。

二、我国贸易和产业特点

1、中国贸易成就斐然

自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至201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持续增长，从未出现过下滑。2015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达到顶峰的13.79%，这是自1968年以后单个国家出口占比的最高记录。这一数据引发了诸多反思：中国出口是否存在过度的情况？但需指出的是，单一出口占比指标并不全面，还需结合我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参考出口依存度指标（即出口占GDP的比重）进行综合分析。2006年之前，我国出口依存度持续上升，最高达到35%；2006年之后，该指标持续下降；2011年之后，我国出口依存度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通过数据可知，我国出口依存度仅在个别年份短暂超过德国和韩国，两国的出口依存度总体远高于我国；而美国、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则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另一个分析指标是出口占比/GDP 占比，其分子为一国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分母为一国 GDP 占全球总 GDP 的比重。我们可通过这一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设定一个简单基准值1——若一国 GDP 占全球10%，则理想状态下其出口额也大致应占全球市场10%，这一基准值仅为理论上的参考线。

从数据来看，我国在部分阶段该指标高于1，即我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高于理想基准值；2011年之后，该指标始终低于1，意味着我国出口额并未过度超出理论应得份额。反观德国与韩国，其该指标始终远大于1；而美国与日本的该指标则始终小于1。综上所述，中国出口具有自身特点：出口规模大、全球占比高，但相较于理想基准份额，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般“过度”。

我国进口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特征。同样构建进口占比/GDP 占比指标可知，我国进口相关指标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例如，2004年起该指标开始下降，2008年之后便小于1；到2023年，我国进口占比只相当于我国 GDP 占比的约60%，即相对于 GDP 规模而言，我国进口明显不足。需注意的是，德国、韩国的进口相关指标同样远大于1，美国、日本的进口相关指标则远小于1，即德国、韩国不仅出口指标高，进口指标亦高；美国、日本则出口与进口指标均低。我国出口指标并非特别高，进口指标却更低，甚至已低于日本。我国市场规模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

2、中国制造业成就无与伦比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领域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的特点我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崛起速度快。200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为6%；2023年，该比重已升至35%，增长速度极快。

第二，产业规模大。2023年，我国制造业产值达到4.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联合国《工业化的未来》（2024）报告指出，到2030年（线性外推），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例将进一步上升至45%。美国的占比将降至11%，日本降至5%，德国仅为3%，三国总和不足中国的一半。

第三，产业门类全。中国是全球工业体系最完整国家，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大类、600多个细分行业的国家。

第四，前沿科技强。据《南华早报》相关研究显示，在2025计划十大产业的260余项具体目标中，截至目前已有86%得以实现；我国科技发展势头良好，尤其在技术规模化应用领域，已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客观而言，在光刻机、航空发动机、生物材料等诸多尖端技术领域，我国仍存在需要攻克的难题。

这些特点也为我国带来了“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国烦恼”。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意味着全球调整、适应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周期短；庞大的产业规模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较强；齐全的产业门类既使我国在出口市场面临较多竞争对手，也导致我国进口需求相对较弱。而强大的前沿科技实力，意味着我国未来竞争力将进一步提升，这也引发了全球各国对我国发展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各类特征背后存在内在逻辑。

3、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按照过往自由市场规律，中国没有“出口过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出口不足，与德国、韩国相比我国更是出口过少。

第二，从全球视野下来看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进口不足，市场规模优势有待发挥。

第三，中国面临“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国的烦恼”，在研判未来产业发展与贸易走向时，若单纯依据过往自由市场规律，可能会预期我国应该实现更快速度、更大规模的出口。但结合前文提及的全球形势变化，我们需认识到“世界已发生改变”，不能再以过去40余年的经验应对当前的问题与挑战，而需以全新认知判断未来贸易发展模式。

三、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优化调整

1、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优化

一方面，我们要跳出制造业来看制造业发展，从国家总体战略、未来世界秩序层面来看产业发展，需要考虑国际战略竞争中的国际关系大局、中国软实力、国际引领力，即发展要更具国际包容性。另一方面，制造业在国家发展与战略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制造业必须持续、高质量发展。因此，新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方针，建议是规模守正、结构创新，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稳规模与优结构二者相辅相成。正如《建议》中提到的，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重构

关于我国如何实现调整优化，核心在于两个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一方面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扩大内需。

从供给端来看，需推进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具体包含两个维度。在国际维度方面，推动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在国内维度方面，推动国内产业动态升级。两个维度，均需坚持“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原则，掌握主动权。此处所提及的产业升级，就国际梯度转移而言，若将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同样有助于国内产业升级。

从需求端来看，核心在于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这一举措是战略选择，绝非权宜之计。尽管产业升级与扩大内需两项任务均面临较大难度，但在新阶段我国必须实现突破。

关于产业国际梯度转移问题，为何强调“有取有舍、有序转移”？事实上，国家在该领域已有明确指导思想，即淘汰落后产能，且对“落后产能”的界定十分清晰：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而无法在现代产业发展需求、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行业标准、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阻碍。我国需坚定不移地淘汰这类产业，且众多发展中国家具备承接能力，这对其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在产业国际梯度转移过程中，我国需遵循高质量发展原则进行布局，**四中全会《建议》已明确提出：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当前也已提出“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的区别。**

当提及“中国经济”与“中国人经济”时，“中国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外投资、企业出海相关，这与我国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一脉相承。但产业国际梯度转移需遵循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已发生四次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正是这类转移推动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深化，加速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溢出，带动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体系。

近年来，我国也开展了部分产业梯度转移，但主要发生在国内，即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也有少量向国外转移。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区域差异显著、内部市场纵深广阔且规模庞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国完备的产业链优势及政策调控作用。这部分打破了传统雁阵的转移逻辑，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弱化。

开展产业国际梯度转移时，“有取有舍、有序转移”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既做好国内梯度转移，也做好国际梯度转移：把握好平衡，防止产业空心化教训；保持内外产业与技术代差；巩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枢纽地位。二是传统产业发展好新质生产力，进行改造提升，不能“一退了之”。“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三是缓解我国面临的全球性贸易压力、塑造更好的包容性的外部发展环境；规避贸易战带来的被动、无序、突发大规模产业转移。四是我们要认识到历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全球产业大转移，这是客观规律。未来5-10年，很可能迎来一轮新的大规模的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在产业的移入、移出上需要有提前研判。其中，以中国技术变革的速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近30%的产业基础，中国极有可能是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最重大来源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重大机遇，中国需要有所规划，在世界经济格局重塑中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也面临国内难题，包括国内就业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边疆问题等，建议采取采取“分类治理”的思路，一方面尊重市场规律，充分挖掘产业转移和升级带来的各种国际国内益处，另一方面利用体制优势，做好分配调节，解决好其他问题。

关于国内产业升级，核心是以新质生产力理念为指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尤其需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与创新。高科技产业的比较优势及创新影响因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建议》对如何挖掘我国产业优势与市场优势已作出充分部署，核心在于提升契约执行力度，加强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打破市场垄断，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等。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与贸易格局，本质上取决于传统产业与高端产业的竞争态势。具体而言：传统产业将逐步调整，或转移、或淘汰、或升级；高端制造业则在快速发展，最优局面是传统制造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高端制造也稳步发展提升；最差局面是传统制造业被迅速抛弃或被动转移，高端制造业发展受阻。我国需努力争取最优局面。

3、提振消费、扩大内需

《建议》用较大篇幅论述了这一议题，其中较新的表述包括提高居民消费率，提振消费需求强调“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首先，除消除各种消费壁垒，提振消费破局核心抓手在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收入是消费的根基，有利于扩大消费规模、进口规模，引导产业升级等。关于如何提高劳动力收入，应树立“劳动者收入闯关”意识。劳动力收入提升固然会带来诸多压力与挑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但我国曾有“价格闯关”的成功经验，劳动力收入提升本质上也是劳动力价格的调整，因此需具备“闯关”意识。尤其在 AI 时代来临之际，这一任务更为紧迫。

提升劳动力收入可从两个维度推进。一是创造高薪岗位，此类岗位无法由低端产业提供，因此需发展高端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各类制度性扭曲，无需进行惊天动地的重大变革，从解决细微的制度性扭曲入手即可。例如：保障劳动力自由流动，破除社会保障、户籍等方面的限制；实现同工同酬——这一举措可影响大量人的收入；规范过度加班现象。过度加班不仅影响消费、加剧内卷、降低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还对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就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我国当前法定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但最新数据显示，实际平均周工作时间为48.5小时。若能将实际周工作时间降至法定的40小时，理论上可新增21%的就业岗位。目前我国非农就业人口约6.1亿，若将周工作时间从48.5小时降低为40小时，需额外增加约1.28亿劳动力才能完成现有工作量。由此可见，解决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扭曲，可有效应对就业等国内问题。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新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展开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原高级经济学家胡捷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核心是“从全球化1.0向2.0转化”，关键差异在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价值认同三要素的排序。1978年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全球化1.0时代，经济利益被置于首位，如福山《历史的终结》认为世界会趋同、克林顿主张通过贸易促中国制度趋同。而当前欧美精英认知转变，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认为“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副总统J·D·万斯担忧“欧洲面临着价值观的退却”，国家安全与价值认同权重上升。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三大事件加速这一转化，前者引发贸易与科技主导权冲突，疫情暴露全球产业链脆弱性，俄乌冲突推动阵营分化并辐射经济层面。

应对新形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多维度发力：一是分散国际市场，降低对欧美市场依赖，挖掘其他市场潜力，契合企业出海与国家经济安全需求；二是扩大内需，作为立身之本，减少对外需依赖，形成内需支撑；三是激活微观主体，依靠企业家创新解决宏观问题，

发掘企业家活力；四是**调整国际秩序参与方式**，明确中国从规则追随者转为参与者，倡导“对等公平贸易”，重视外需长期性，处理好与主要市场及技术供应国关系，同时通过扩大内需兼顾“大乙方”和“大甲方”，提升谈判地位。

商务部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指出，“十五五”时期全球化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有利因素包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运筹国际空间和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逐步增多，为外需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不利因素则包括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等。从贸易增速看，2021-2022年及2025年上半年贸易增速快于GDP增速，预测2025年世界出口额将达25.8万亿创历史新高，“十四五”世界出口年均增速8.5%，大概率“十五五”时期贸易增速持续增长甚至快于GDP增速。世界贸易增长动能中，“十五五”时期新商品或成全球贸易主导，同时单边主义致产业链本地化、霸权主义致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均可能扩大部分跨境贸易量。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艰巨、就业与居民收入增长压力大、人口结构变化等挑战。今年以来，我国出口新动能（芯片、汽车等）增速表现突出，中间品出口占比创新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贡献率高，仅对美出口下滑拖累增速，且美对华关税差缩小或利好出口。利用外资有触底趋势，对外投资合理有序增长。政策建议方面，我们需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扩大国际市场需求；发挥外贸创新作用，优化货物贸易、发展服务与数字贸易，拓展双向投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挥外需（贸易、投资）引领作用，塑造外部环境以拓展外需空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经济全球化面临困难、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关键在于其政治基础逐渐消失**。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由美国领导建立多边主义经济体系（含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基础是成员间有国家安全互信，认为彼此不会成安全威胁，且美国无领土野心。如今该共识消失，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俄乌冲突让西方意识到全球化难消底层分歧；新冠疫情凸显国家间隔阂与不信任；中美综合国力竞争显性化，尤其是2018年后。

中美竞争重点渐进演变。1979年起从局部产品竞争，到产业层面，再到政策、机制、体制问题，特朗普时期上升到国家层面与地缘政治安全。中美并非横向产业竞争，入世后是垂直分工互补，中国未威胁美国核心制造业，竞争实则是体系性、综合性的。由于我们无法在综合国力竞争方面让步，所以中美竞争是无解的但或有边界，双方有管控风险需求、紧密依

赖及相互摧毁能力，重大冲突可能性小。未来国际贸易体系不会截然分为“两个世界”，而是复杂碎片化、集团化且相互嵌套的。中国需积极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稳定，推动有序渐进变革，维持WTO等基本运转，发挥领导力建“小群”，利用“一带一路”、RCEP等平台，按议题建制度化体系，逐步吸引国家加入。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指出，21世纪初主要被视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当前我们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从国际视角来看，学者们通常用两个词来概括这一时代的特征。一是“VUCA”时代，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这表明我们正面临一个艰巨、繁复且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二是“VANL”时代，即脆弱性（Vulnerability）、焦虑感（Anxious）、非线性（Nonlinear）和非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无论何种表述，都反映了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具备风险与挑战并存的特征。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明的道路非常清晰，即继续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六个坚持”的任务中，经济高质量发展位列其中，同时还要求致力于实现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效能治理。四中全会指出，要从12个方面推进工作，应对国际经贸形势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十五五”期间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即2035年GDP比2020年翻一番。面对战略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国际经济形势，只要我们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定能在21世纪的变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稳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新变化，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余淼杰 国际经济学会会士，辽宁大学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余淼杰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上的发言

一、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国际经贸形势的新变化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与新世纪之初相比有明显的不同。21世纪初主要被视为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当前我们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从国际视角来看，学者们通常用两个词来概括这一时代的特征：

一是“乌卡（VUCA）”时代，即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这表明我们正面临一个艰巨、繁复且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二是“巴尼（BANL）”时代，即脆弱性（Brittle）、焦虑感（Anxious）、非线性（Nonlinear）和非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无论何种表述，都反映了当前国际经贸形势具备风险与挑战并存的特征，具体来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国家推行贸易单边主义、贸易霸权主义，美国在特朗普进入第二个任期后，在全球范围内大打贸易战。

第二，南北国家差距可能呈现扩大趋势，北方国家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尽管南方国家从世纪之初到今天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但在当前阶段，随着拟全球化势力的抬头，南北差距面临逐步扩大的风险。

第三，国家内部，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也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受科技进步影响，对白领工人的需求上升，如果蓝领工资保持不变，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就会扩大，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第四，全球供需不平衡格局下，国际分工专业化更加清晰。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以农产品出口为主，但也有例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南方国家，出口结构已显著优化，机电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

二、依托国内竞争优势，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国内角度来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稳中求进的态势并没有改变。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二是具有全产业链比较优势；三是拥有人才优势；四是具有体制机制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政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明的道路非常清晰，即继续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六个坚持”的任务中，经济高质量发展位列其中，同时还要求致力于实现高品质生活、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效能治理。四中全会指出，要从12个方面推进工作，应对国际经贸形势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保“十五五”期间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并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即2035年GDP比2020年翻一番。这12个方面的工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需求、供给和价格三大宏观层面。

第一，从供给角度看，目标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夯实实体经济。目前全球1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他国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不足、生产力未能提升、缺乏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因此，我们要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航空强国、交通强国等，重点做好三篇大文章：一是做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核心是推进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其中，“融合化”替代了以往所讲的“数字化”，原因在于数字化应当与实体经济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形成“两张皮”。二是发展新兴产业，三是推动未来产业。特别是对未来产业，包括人工智能（AI）在内，要进行具体引导，例如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领域。

第二，从需求角度看，重在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这是实现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优势的关键依托。要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统一，以及通过各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来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第三，从价格层面看，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归根结底是价格的形成问题。商品市场目前已基本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前的着力点和重点在于要素市场。要让市场机制在要素市场发挥作用，包括土地、资本、人才等方面。特别是人才方面，建立流通顺畅的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是我们的目标所在。

第四，关于政策落地，必须一以贯之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落实新发展理念，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即创新。要做好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因地制宜”来概括，具体分为三块：一是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二是要素创新性配置；三是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要强调的是，传统产业不代表落后生产力，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传统产业如冶金、化工以及发展良好的船舶产业，经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支撑，完全可以变成朝阳产业。目前我国创新表现可圈可点。例如，我国研发强度达到2.69%，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2.66%的平均水平；整体创新能力已位居全球前十。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大模型开源能力已超过美国，闭源模型与美国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从原先认为的一年半缩短至三个月到半年，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

坚持绿色发展。必须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深入到方方面面，同步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坚持协调发展，主要是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回顾过去14个五年规划，我国年平均增速达到5.4%。2020年我国GDP为100万亿人民币，现在达到135万亿人民币，增长了35%，这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德国，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保持每年4.5%的增速，到2035年我国就能达到美国的水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统筹发展与安全。除了上述方面，还要强调“三农”问题、文化强国和高水平安全。什么是最高水平的安全？发展就是最高水平的安全，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保证高水平的安全。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其“静”与“动”之间的关系。

三、推动构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关于对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的核心观点是：构建一个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1. 坚定捍卫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

尽管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但世界依然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两个基本特征，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多边化没有改变。去年全球外贸总量达到3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这依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数据。如果没有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的经贸蛋糕会做得更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已毫无疑问成为捍卫全球自由贸易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的目标是推进平等、互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不是让一个国家占便宜而另一个国家吃亏，也不是将某些国家排除在外，而是普惠包容的。

2. 以“四大倡议”引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若要实现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其目标必须是构建一个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我们反对美国的一国独大，也不提倡“G2”，而是提倡平等、有序的多极化，秉持“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为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指明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3.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具体落实上，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在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基础上，重点实现金融融通和民心相通。我们要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实现企业的“走出去”“走进去”和“走上去”。这不仅能为东道国提供就业机会，更能输出我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術，有助于提升当地的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其次，在推进经贸合作中，要实现制度、规则的相互连通。未来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工作的重点在于规则、规制方面的协调，这也是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内容。最后，重视民心相通，落实“小而美”的项目，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需求置于优先位置。

4. 推进双向开放与贸易自主创新

我们要积极推进双向开放和自主开放。所谓双向开放，一方面是高质量引进外资。在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准入后的“准营”，并持续缩减负面清单。另一方面是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双向直接投资。所谓自主开放，重点在于贸易层面的自主创新。鉴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大背景，贸易产品的重点不再局限于最终品，而是应着重于中间品。因此，我们要大力推进中间品贸易，同时积极推进绿色产品贸易，这是外贸工作可以发力的重要方向。

总而言之，面对战略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国际经济形势，只要我们沉着冷静、积极应对，一定能在21世纪的变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稳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全球化政治基础的消解与中美竞争下的秩序重构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屠新泉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上的发言

一、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正在消解

对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我非常认同大家的判断。我想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经济全球化当前面临的困难或逆全球化趋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政治基础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正如最近中日关系出现波折，即便是经济全球化也是有政治基础的。因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而市场是需要制度支撑的，或者说是需要权力支撑的。

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实是由美国领导建立的，它制定了一套相应的多边主义经济体系和制度，包括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WTO等。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制度，或者说各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去建立制度，主要原因是各国都相信：美国领导的这个群体内部，彼此之间不会相互威胁国家安全，不会成为敌人或对手。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作为“老大”在维持秩序；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也常称美国为帝国主义，但这个帝国主义与以往的有较大区别，它至少没有领土野心，没有想着占领哪个国家。这是非常大的区别。因此，二战后刚建立关贸总协定体系时，其实是没有苏联体系国家的，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因为苏联体系国家认为美国是其国家安全威胁，不愿加入，美国也并未邀请。所以，二战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和冷战后WTO的建立，都有一个隐含的“国家安全”共识，即成员彼此之间存在相互的安全信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体系内部都是志同道合的国家。

1999年中美进行入世谈判时，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假设的。当时的美国依然是不可撼动的单极霸权，经济非常强劲，且有海湾战争余威，没人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中国既无此想法也无此能力，美国也无此担忧。所以，当时入世谈判时，美国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打开中国的市场，时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经常讲：“我来主导这个谈判，就是要把它当成一场纯粹的商业谈判；我的目的就是要为美国企业创造最大的商业利益。”她没有把国家安全问题或国家竞争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如果美国当时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也不会让中国加入WTO，这是非常大的基础性前提。

但是现在，这个共识“消失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彼此不再信任，且将部分国家视为安全威胁或地缘政治对手。主要原因我有三点理解：第一，**俄乌冲突是一个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它让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真的消除国家在底层逻辑上的分歧，无论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还是文化认同。因此，它们认为全球化或一体化应该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开展，一部分国家注定要被排斥在外。第二，**新冠疫情的冲击**。这在微观和宏观政策层面都有影响，造成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危急时刻各国首先想到自己。全球化远远没有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最关键的是中美综合国力竞争的显性化和白热化**。尤其是在2018年以后，这个问题成为决定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秩序的关键。

二、中美竞争的演进与本质：综合国力的体系性博弈

我对中美竞争的过程和历史做了一个梳理，竞争重点是不断演进的：

早期阶段（1979年起）：贸易矛盾早在1979年美国第一次对华反倾销时就已开始。起初是局部的、个别产品的竞争，随后扩展到广泛的产业层面，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一直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产品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竞争。

9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政策性问题。当时美国认为贸易逆差源于中国不够开放，所谓“不对等开放”。中国入世谈判时，美国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打开中国市场。结果是中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几乎所有条件，无论是关税还是服务业的开放。

2008年危机后：美国将所谓全球不平衡问题归结到中国的汇率问题，随后又扩展到机制性和体制性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关注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干预”问题。

特朗普时期至今：更多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问题，即综合国力竞争、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

从时间点看，入世前是具体的产品、产业竞争；入世后涉及深层次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从特朗普第一任期上任并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我一直有个观点：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产业竞争问题。实际上中美真正相竞争的产业很少。美国的制造业衰落早在中国入世前甚至进入世界市场前就开始了。例如美国常提的造船业，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基本消失，被欧日韩打败；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也与中国无关。

中国入世后，中美建立的是垂直分工、互补的产业链关系，并不是横向的产业竞争的关系。美国学者提出所谓的“中国冲击”打击的是美国残留的家具、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威胁其核心制造业（如汽车、芯片制造）。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的芯片制造比中国强得多；到了拜登政府出台芯片法案时，中国在芯片制造本身仍不如美国，只是在封装领域稍强。此外，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封杀华为，是因为华为在5G领域领先了，而实际上美国自己并没有5G产业，其电信设备制造业多被欧盟的诺基亚、爱立信收购。

正因为中美竞争不是产业竞争，而是体系性、综合性的综合国力竞争，所以这种竞争是“无解”的。产业利益可以做一定的让步、让渡，比如日本曾通过将部分汽车制造业等产业转移到美国来缓和美日关系，但对于综合国力竞争，中国无法让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有权追求自己的发展，使自身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不可能因为美国不满意就主动停止发展。

当然，竞争无解不代表一定会恶化到严重的对抗、冲突乃至战争。双方有管控风险的需求，如近期贸易战的缓和就是例证。我将中美关系类比为冷战期间美日和美苏关系的加总，尽管对美国来讲，中国确实是巨大的挑战，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但是中美之间又有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具备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无论经济还是军事）。这使得对抗是有边界和阈值的。我认为真正出现重大的冲突或者对抗的可能性还是较小的。双方可能在未来博弈中找到舒适的“着陆区”。正如刘青老师所言，大家对中国崛起都有一个心理调适过程。中国自己也没想到崛起得这么快，就像入世时没想到发展这么好一样。如果在和平条件下完成这个调适，即便有一些经济摩擦和贸易冲突，也不足为惧。

三、国际贸易秩序的未来：碎片化、集团化与“马拉松”式竞争

关于未来国际贸易秩序或体系将如何演进，我有以下理解。

1、体系特征：不会重回“两个世界”，而是相互嵌套的碎片化体系

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正因国家安全或地缘政治博弈而发生分化，这种分化必然是沿着地缘政治的界限开展的。2022年我曾参加过一个部委组织的专家内部讨论会，当时会上讨论过“两个世界”或者“两个市场”会不会重新出现？从目前来看确实有这个苗头。但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出现冷战时期那样截然划分的“两个世界”，未来的体系将是更加复杂的、碎片化的、集团化的，但又是相互嵌套的。

一方面，过去30年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各国之间形成了基于相互投资的、垂直产业链的分工体系。虽然一定程度的脱钩是必然的，但要完全脱钩、完全切割，变成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方面，虽然现在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互信不再，但很难出现二战和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局面，这种可能性不大。冷战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二战主要争夺领土资源。从现在看，包括中国在内对这些问题仍有兴趣的国家很少。我们对于扩张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兴趣。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没有让别的国家也搞中国式现代化，各国可以搞自己的现代化。

2、竞争性质：是“马拉松”而非“拳击赛”

我有一个类比：现在的国际竞争或者综合国力竞争，更像是一场马拉松，主要看谁跑得快、谁跑得久。跑在后面的国家也不会真的被摧毁或消灭。虽然大家有时讲产业竞争很残酷，但一个国家不会真的因为产业竞争失败就出现崩溃。这不像是一种“拳击赛”，非要把对手打倒才停止。因此，各国采取极端措施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尽管民粹主义和舆论可能会炒作这种情绪。

3、发展趋势：内循环为主与盟友间的“信任赤字”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都会努力提高内循环或依靠内部市场的比例，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这确实是一个导向。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体系不同的国家中，彼此相似的国家之间信任度现在也不高。例如英国脱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英国不相信欧洲大陆。特朗普发动全球性贸易战，美国的盟友也发现美国不可靠，只不过它们对中国的不信任度更高一些。有一段时间WTO里讲“WTO减1”，现在又开始讲“WTO减2”。但是各国也知道与中美彻底脱钩不现实，所以欧盟提出“去风险”概念，而且所谓的中等国家、中间国家彼此之间正在“抱团取暖”，欧盟也在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展讨论，探讨欧盟与其合并或加入的可能性。

4、哲学思考：保持“边界感”未必是坏事

这种变化对全球化角度来讲肯定是坏事，因为是碎片化的；但从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讲，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未必是坏事。我始终认为，任何事物不是越怎么样越好，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也是一样，不是一体化越深越好。就像人际交往强调“边界感”，再亲密的关系也要有边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美国现在的担忧和不舒适，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依赖另一个国家，这从心理角度会造成不安全感。因此，保持一定距离没什么不好。

四、 中国的影响与应对：回归常态与渐进式变革

中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既依靠我们自己正确的政策选择和规模优势，也依靠外部开放体系带来的机遇，让我们有机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现在全球化倒退，从负面冲击来讲，中国也是最大的承受者之一。但这种冲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渐进地做准备。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开始就显著下降，这是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当时中国一直被批评贸易顺差太大，占GDP比例最高曾达7%左右，金融危机时中国被指责造成全球不平衡，不得不做调整。另一方面这也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德国、韩国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日本、美国相对较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不高。所有大国经济主体都是内循环，外循环是辅助。中国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高度依赖外循环是特例，不是常态，现在是回归常态。虽然从比例上看外循环对大国似乎不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关注贸易。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时贸易依存度只有10%，但美国费了很大力气领导建立了战后的多边贸易体系。因为外循环一定程度上是大国转移内部矛盾或弥补国内大循环不足的重要方式，再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完美的内循环，总存在供给或需求的短缺。美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其国际经济战略，相反美国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包括收入分配和投资分配问题。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

第一，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维持WTO、IMF等基础框架的基本运转。尽管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但世界贸易仍有70%以上是按照WTO规定的最惠国关税进行的。对中国而言，维持现有体系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第二，我们要推动现有体系变革。**主要目的仍然是维持现有体系，因为不进则退，没有持续向前的推动就会有更多国家倒退。**第三，中国要发挥领导力，要“建群”，即建立中国自己领导的群。**这个群不一定要求全，可以像美国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初期那样，只选择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小群”。“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很好的基础，但“一带一路”倡议网络非常广泛，可能不太适合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应该按照特定议题组织一部分国家建立更加制度化的体系，同时保持对外开放，未来吸引更多的国家逐步加入。**第四，要利用现有平台，**像RCEP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利用，加快推动升级、扩围，纳入更多议题和新成员。

总之，中国始终要坚持长期战略和渐进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未来的国际体系变化。

从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转型——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经济应对

胡捷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原高级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胡捷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上的发言

一、如何看待“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

为了形象地阐述我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观察，我将其概括为“从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的转化”。这是我所总结的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的一个宏观脉络。

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微观企业层面，通常都会考量三个核心因素：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经济利益，三是价值认同。所谓的1.0时代与2.0时代，其区别在于这三个因素的排序权重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化1.0”时代，即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这大约40年的时间里，经济利益被置于首位。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排序，并非因为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在那个时段不重要，而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大部分人，特别是欧美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的差异似乎并不构成追求经济利益的障碍。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各方主要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全球化布局中，只要账面计算可行，成本收益合适，相关经济活动就会推进。

为了说明当时的时代氛围，我列举两个典型的代表性观点：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这一著作发表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一年。当时以福山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无论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文化背景或经济制度现状如何，最终似乎都将走向同一个终点，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国际社会似乎更专注于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层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观点也极具代表性。他在1993年、1999年及2000年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及中国加入 WTO 的听证演讲中，一再强调一个观点：通过扩大贸易和经济自由，可以在中国促进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当中国公民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独立性时，他们自然会要求在政治体系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他深信，自由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将促使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与其趋同。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便形成了我们所见证的“**全球化1.0**”时代的核心特征：**各方暂时搁置了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的差异，主要依靠经济利益驱动全球化进程。**

然而，观察今天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到欧美精英界对这一认知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同样举两位代表人物的言论为例：

美国现任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演讲中直言：“很多美国人曾经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事实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站在他的立场来看，这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失望情绪，认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实际上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

美国副总统 J. D. 万斯上半年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欧洲面临着价值观的退却”。他所指的所谓“退却”，隐含了对伊斯兰大规模移民进入欧洲等现象对欧洲传统价值观带来冲击的担忧。

这两位观点极具代表性，表明**在当前的国际博弈场中，欧美决策者对自身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背后所谓的价值观体系所受到的冲击，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包括全球化的逆流，其更为深刻的原因正源于此。当然，这其中还有更多因素，例如国内贫富不均、全球化导致不同群体受益受损程度不一等，这些都引发了当前对于全球化的反思或调整。但我认为，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于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体系的认同危机——即大家到底能否求同存异？能否在全球化交往过程中，逐渐在方方面面进入更加有序的和平相处状态？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反思。

这种从1.0向2.0的转化，从时间跨度上看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近期有加速的迹象，有以下三个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

第一个事件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上台后，由于其特殊的个性及非传统的政治风格，导致了中美之间表面化冲突的爆发。这场冲突始于贸易，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产业空心化问题、科技主导权问题，推而广之则是世界主导权的问题。因此，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第二个事件是两年后的新冠疫情。疫情迫使全世界都在反思：现有的产业链全球化分布式布局是否最为合理？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其脆弱性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实际上非常明显。

第三个事件是俄乌冲突。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国家安全及背后的价值观认同在世界阵营分化与重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在冲突爆发后非常明确地站在了乌克兰一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当然也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考量。这促使各国在世界面前表态，对整个国际阵营的分化产生了明显影响，并自然而然地辐射到了经济层面。

综上所述，国际形势的变化因素众多且过程复杂，是在动态发展中演进的。如果一定要梳理出一条主线，我提供的思考维度是：我们正处于从全球化1.0向2.0转化的过程中，而1.0和2.0的主要区别在于三个要素的排序变化：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

二、新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深化改革的路径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该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我将分几个层面进行阐述：

第一，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在宏观经济导向和企业微观选择上，直接考量是分散国际市场风险。过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出口重心侧重于欧美市场。从目前来看，欧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毕竟其在吸纳产品能力方面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必须考虑分散布局。这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企业出海的案例，深感市场分散化极具潜力。尽管分散后有一部分产品可能会通过转口贸易最终流向欧美，但扩大其他新兴市场的份额仍有挖掘空间。这既与企业出海解决自身经营挑战的微观诉求相符，对国家整体经济安全而言，分散国际市场也是宏观上的正确导向。

第二，必须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之下，拥有一个稳固且强大的内需市场无疑是立身之本。客观情况是，当前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度仍然较强。尽管从各种指标分析，内需仍有潜力可挖，但作为大国经济体，外需犹如我们的“体外心脏”，无论其绝对量大小或比例如何，在国民经济全身循环中起到的拉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其能量减弱甚至被切断，肯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逐步调整结构，向内需倾斜，从而形成良好的、强有力的内需支撑。

第三，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底层问题，那就是激活微观主体。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宏观的、国际层面的，但宏观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实要依靠微观的企业家去创新、去发展、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仅靠政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每个微观主体不能被激活，许多办法是想不出来的。即使有了大方向，也需要每个企业家不断地去创新、去摸索、去试错。目前来看，我们企业家的活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如果这方面能解决得更好，将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在深化改革方面，怎么样激活微观动力，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四，我国对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应持有何种主张？面对全球化2.0时代，相对而言，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国际秩序观？

在战略定位上，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中国已经从40年前的“小玩家”或对市场无重大影响的参与者，成长为今天的“大玩家”。随着体量升级，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对世界经济平衡、贸易平衡乃至战略安全平衡都有巨大影响。我们正从规则的追随者升级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去面对世界。例如，我们是否应该主动提倡“对等公平的贸易”？在过去的环境中，当我们弱小的时候，客观地讲，贸易规则对我们是有所倾斜和优惠的。但现在我们要理解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能真的要主动去面对公平贸易、对等贸易的新格局。这种“公平”与“对等”是广义的，不仅仅局限于关税水平，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影响贸易和经济竞争的因素。除了关税之外，还包括增值税、出口退税、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许可、进口配额、卫生壁垒、技术壁垒及其他种种壁垒，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规则、劳工条件、环境保护、汇率调控，以及产业出现的低价倾销问题等。如果我们能以新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者，或者至少是主要参与者、主导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我们的心态和眼界都会发生变化。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深入考虑的方面。

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外需对我们的重要性，以及这种依赖的长期性。我不认为我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外需。实际上，外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其绝对量如何，即便比例上看还有潜力，但它的存在对拉动我们的经济循环——不仅是外贸相关的循环，也包括内循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部分循环出现问题，实际上会拖累我们所有部门，导致经济体在相当程度上出现疲弱状态，这对进一步转型非常不利。如果我们这样看待问题，就必须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世界主要市场国家、技术强大供应者国家的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价值体系、经济利益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价值观认同和利益，也要把对方的问题考虑进来。在全球博弈中，只有既考虑自己的利益、动机、追求和诉求，同时也考量对方的利益和诉求，谋求在新的条件下共生共荣，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内需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短板。不仅是因为经济健康依赖于内需，从外贸角度讲，我们现在实际上处于“大乙方、小甲方”的地位——我们买得相对少一些，卖得更多一些。这导致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相对偏弱。我们要通过努力，把自己变成“既是大乙方也是大甲方”，这样在国际经济博弈中才会有较好的谈判地位。所以，扩大内需也是战略级的考量。

三、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最后，针对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个偏理论层面的思考。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关税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竞争中出现了特别热点、聚焦的政策手段，像特朗普一再利用关税来尝试达成其多种目的，关于关税的讨论也非常多。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存在容易被忽视的盲点，供学者讨论以及政策制定者参考。

第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可能过于粗糙。该理论总是认为，各国只要专注于所谓的竞争相对优势领域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个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世界各国都当成一个整体、一个自然人来看待。其实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时，其内部实际上是多个利益群体的组合。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受益和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在美国表现得非常典型，其实美国的蓝领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受损的，综合而言至少是相对受损的。这造成了其社会的分裂和极化。因此，我们以后在考虑

国际贸易时，不能非常简单地把一个国家想象成单一群体，不能简单化地认为一切保护主义倾向都是“反动派”、是没有道理的“胡搞”。

第二，关于秩序的维护与滥用。不管是旧的国际贸易秩序还是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在秩序形成时都需要各国去维护它、珍惜它，从好的方面去爱惜它，而不是去滥用它。这就像打篮球，规则里可能允许合理冲撞，但如果一个球队不是研究怎么打球得分，而是专门研究怎么样冲撞、尽量去钻规则的空子，这慢慢就会把整个局面搞坏。所以，我认为任何国际贸易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其实都有一定的脆弱性，其中有很多隐性的、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也需要大家去尊重。

第三，全球化国际分工是有大前提的，那就是世界和平。传统理论假定每个国家都在游戏中追求自己人民的经济福祉，但这个前提是：这个国家是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的。如果这个国家在全球村的竞争中，形形色色的国家有不同的诉求，有些国家或许会在某个阶段把经济诉求推到第二位或第三位，而是把其它的诉求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实际上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也是不可持续的。比如如果有人要建立“伊斯兰国”，很显然他对老百姓的福祉就不会那么重视。实际上我们也要跳出经济看世界，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没有可能大家还是共同追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为自己本国人民谋求某种经济福祉？这也是我们整个世界能否从1.0向2.0转化过程中，进入到一个大家还能和平共处、共生共融状态的关键所在。

“十五五”时期应充分发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引领作用

梁明 商务部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梁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上的发言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系统性、准确地研判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形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当前我们对“十五五”时期全球化形势的深入研究，我将围绕全球化新形势、世界贸易增速是否低于经济增速、“十五五”时期国际市场需求是否会出现明显放缓、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及相关政策建议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十五五”时期的全球化形势，是机遇还是挑战？

关于“十五五”时期的外部环境，我们的规划建议中已有清晰论述。在“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发展既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环境。总体来看，我认为有利的因素主要是两点：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这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技术引擎；其次，我国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有利因素的能力正在增强，这将为我国外需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不利环境更多。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国际经贸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这些因素都给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困难。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我们应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经济的增速和贸易增速的关系。在“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国际贸易是否会增长乏力？在“十五五”时期，贸易的增速是否会持续地低于经济的增速，整体国际贸易增长动能有哪些，国际贸易是否有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比“十五”计划以来的几个五年规划时期世界GDP增速与货物出口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在“十五”和“十一五”时期，世界贸易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然而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这一趋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十四五”时期，贸易正在重拾增势。数据显示，2021年、2022年以及2025年上半年，世界贸易增速均快于GDP增速。中国GDP和货物出口增长的趋势与之相似。

根据我们的初步预测，2025年世界出口总额有望达到25.8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十四五”期间世界出口年均增速达到了8.5%，这一水平不仅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的1.6%和“十三五”时期的1.3%，甚至高于“十一五”时期。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个核心假设：在“十四五”乃至“十五五”时期，全球贸易有望延续这一复苏态势，贸易增速会持续增长，甚至会快于GDP的增速。

那么，世界贸易增长的动能在哪儿？是什么拉动了世界贸易的增速呢？从贸易结构来看，“十四五”时期期末比期初的出口额增长了28.7%，其中制成品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制成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在2024年已接近65%。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作为中国优势领域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能矿产品的拉动作用正在进一步下降。2008年，原油进口额占当时世界总进口额的比重约为10%，而到了2024年，这一占比已降至5.5%，降幅接近一半。这表明全球贸易的新旧动能转换正在加快，集成电路、载人汽车等高技术、高附加值商品的占比正在快速上升。随着“十五五”时期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演变，中国的新商品有望继续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导力量。

展望“十五五”时期，我认为世界贸易将呈现出以下新趋势：

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带来三个层面的变化：一是人工智能（AI）投资加速，将导致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全球资本品，以及芯片、存储芯片等中间品的跨境贸易量持续扩大；二是AI智能终端的快速迭代，如智能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眼镜等产品的更新换代，将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推动“AI+消费电子”产品的跨境贸易量扩大；三是能源革命将推动当前世界新旧能源的转换，这一过程将直接导致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设备以及锂电池等储能设备的跨境贸易量显著增加。

第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一趋势促使部分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试图实现部分产业链的本地化，引致相关资本品和中间品跨境贸易量的扩大。

第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在上升。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发生变化，诸如原产地规则、本地成分要求以及针对所谓的“中国成分”的限制措施，导致部分中间品不得不进行跨境迂回流动。这种因规避限制而产生的“绕道”流动，在统计上也扩大了国际贸易的总量。

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外需的“托举作用”凸显

在上述全球新趋势下，怎么样看待我国经济宏观运行的表现？关于“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重点关注：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三是就业与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四是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特别是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消费和投资都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压力。

通过分析各五年规划时期“三驾马车”对GDP的拉动情况，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历史上，除了2005年至2007年净出口拉动率较高之外，“十四五”期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次凸显，2024年及2025年前三季度其拉动作用均达到了约1.5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国内消费和投资面临增长瓶颈。从消费看，最终消费额年均增速呈现稳步下行态势，“十四五”前四年年均增速为7.2%，明显低于“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从投资看，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速也出现了阶梯式下降，“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降至5.6%。然而，净出口在“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高达11.8%，仅次于“十五”时期，且明显快于“十一五”至“十三五”时期。这充分说明，“十四五”期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托举作用”，且外需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较强的免疫力。

从近期数据来看，今年以来尤其是近几个月，社零增速和投资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今年以来，我们的外需还是实现了非常稳健的增长。“十四五”时期，特别是2021年以来，我们整体出口增速都还是非常抢眼的，最近大家非常关注，10月中国出口出现了1.1%的下降，我们做了分析和判断，尽管有结构性变化造成的因素，但整体受节假日的影响还是更大的。如果我们把今年的10月和9月加到一起，外贸出口是增长3.5%的，也就是说整体来看，我们的出口动能还是非常充足的。

在商品结构上，今年以来出口新动能增速表现突出。芯片、汽车、船舶等新动能产品增速迅猛，尤其是芯片产品，前10个月机电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近期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因需求放缓拖累了出口增速，但中间品出口表现强劲，2025年前三季度占比达到47.4%，创历史新高，资本品占比也在稳步提升，后续也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总之，近几个月，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国际经贸规则变化以及关税措施，我们的消费品出口占比是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我们的发展趋势还是契合整体国际贸易趋势的。

在出口国别方面，今年前10个月，我国对美出口同比下滑17.8%，拖累整体出口增速2.6个百分点。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我国出口的贡献率高达95%，形成了强有力的替代支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美磋商推进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拖累也在进一步放缓。10月当月，仅拖累3.8个百分点，明显低于前几个月。

前10个月，我们对非美市场增量明显大于对美国的减量。随着美国对华关税进一步降低，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与从世界进口的税率差正在缩小。下一步如果中美谈判顺利，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取消芬太尼关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税差会进一步缩小。这时候我们对美出口会有反弹式的增长，对我们的外贸出口也是利好因素。

此外，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也呈现出积极信号。虽然利用外资数据近几年有一定下滑，但已出现触底趋势，2025年以来，在个别月份利用外资的同比增速实现由负转正。2025年3月、7月、9月当月同比均实现正增长。此外，利用外资产生的固定资产投资降速也在收窄。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回稳向好，利用外资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会有触底反弹的趋势。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利用外资的整体环境并不是悲观的，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外投资方面，“十四五”时期以来，我们对外投资实现了合理有序地增长。我们初步预测，2025年全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有望达1500亿美元，仅次于2016年，“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速达6.9%，外需增长空间依然广阔。

三、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工作的战略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十五五”时期我们的增长动能在哪里？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在国内产能充足的背景下，在稳定国内总需求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国际市场需求，依靠强劲的外部需求来对冲和突破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发展压力。除此之外，也要提振国内消费以及扩大有效投资，但仍然要把重点工作放到实现外部需求牵引作用上，靠外需应对内部的结构变化。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进一步发挥外贸创新发展的作用。这需要我们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优化升级货物贸易结构，同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并创新发展数字贸易；二是拓展双向投资的合作空间，既要通过扩大利用外资来强化资本形成、优化供给和带动就业，又要通过高质量的对外投资推动中国商品、服务和标准“走出去”，从而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做大中国经济规模；三是

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步伐，特别是要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需求。

第二，在当前环境下，要充分发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引领作用。我们要充分利用贸易和投资这两个轮子，在“十五五”时期主动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外需发展空间依然不小。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05
Add: 1104, Li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